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23年2月27日至3月31日

议程项目3和5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机构和机制

人权、民主和法治论坛第四届会议

主席的报告

概要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28/14号和第46/4号决议，人权、民主和法治论坛第四届会议于2022年11月24日和25日在日内瓦举行，主题是“加强民主政体，以重建得更好：挑战和机遇”。本报告概述了论坛的讨论情况、结论和建议。



一.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第 28/14 号决议决定设立人权、民主和法治论坛，以便为促进就这些领域之间关系的相关问题开展对话与合作提供平台，并查明和分析各国在努力确保尊重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的最佳做法、挑战和机遇。理事会在第 46/4 号决议中决定，论坛第四届会议的主题为“加强民主政体，以重建得更好：挑战和机遇”。
2. 人权理事会还在第 28/14 号决议中请理事会主席为每届会议任命一名论坛主席。巴哈马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Patricia A. Hermanns 获任第四届会议主席。
3. 论坛第四届会议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¹ 在制定过程中吸收了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意见。² 本报告概述了讨论情况和建议。
4. 论坛第四届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和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部分与会者以线上形式参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国、联合国专门机构、区域和政府间机构、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二. 论坛开幕

5. 人权理事会主席费德里科·比列加斯在开幕词致辞中表示，理事会在第 28/14 号决议中强调了保持关于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对话的重要性。论坛成立后，成为了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氛围中就确保尊重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的经验、挑战和良好做法进行交流的空间。在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恢复的背景下，理事会选择“加强民主政体，以重建得更好：挑战和机遇”作为主题，以鼓励各国再次申明致力于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之作为大流行后重建得更好的蓝图。理事会还鼓励各国在各层面促进善治，建立有实效、负责任、透明的机构以及反应更加灵敏、更具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的决策进程。鉴于每次危机中都可能出现机会，论坛提供了一个空间，以便思考疫情对民主体制和进程、人权和法治的影响。对民主体制和进程的复原力水平进行分析可有助于查明差距，以便为未来的全球危机作准备。
6.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在开幕致辞中着重谈及，信任是本次论坛主题的基本核心概念，也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他强调，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的增加体现了持续的信任危机。他指出，不信任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加剧，并已渗入民众与体制所达成的社会契约的根基，同时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不确定性，加之生计丧失和政策反应瞬息万变，甚至动摇了最强大的民主政体。疫情相关人权挑战给民主政体的正常运作和公民空间造成了损害，例如滥用紧急措施和中止司法和行政机构的活动。他指出，恢复政府与其服务的人民之间的信任以及整个社会的信任有三个关键因素：(a) 更强大的体制；(b) 真正的参与；(c) 自由和权能得到增强的公民空间。恢复对政府决定和对体制的信任对于民主政体的合法性与运作至关重要，只有通过真正的包容性、对话、问责和遵循

¹ [A/HRC/FD/2022/1](#)。

² 可查阅 www.ohchr.org/democracyforum。

人权与法治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让受影响最严重和代表性最低的群体发声可以确保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参与，为民间社会行为体创造安全的环境则有利于行使赋权权利。他强调，各种形式的公民空间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而有活力的民间社会、自由媒体和积极参与的学术界是健康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7. 论坛第四届会议主席表示，COVID-19 大流行加剧了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人权挑战，包括与经济衰退、不平等加剧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挑战，所有这些挑战都对民主的复原力构成严重威胁。疫情相关经济衰退所致失业暴露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弱点，往往导致政治不稳定和对政府的不信任。这次危机的教训之一是，更平等地向各类人群提供社会机会的国家，其民主政体受到削弱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疫情还显示了阻碍民主进步的内在不平等。疫情及其应对措施影响到所有人群，但尤其影响到有可能掉队的群体，例如生活贫困者、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族裔和种族少数群体以及土著人民。最后，疫情是未来全球危机的一次预演，气候变化就是这些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并产生深远的毁灭性影响的危机之一。气候变化加剧了不平等，令贫穷和粮食不安全更加严重，导致人口流离失所，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并可能导致各国不得不在本国的民主目标方面作出妥协。而可持续地应对气候危机又需要有力的民主方法和机制，例如具有包容性的决策、有力的问责程序、对独立媒体重要作用的承认和准确信息的自由流动、创造力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在决策中的积极参与。这些民主机制的复原力在疫情危机期间受到了考验；气候变化带来了同样艰巨的挑战。

三. 在逆境中学习：探讨疫情背景下民主受到侵蚀问题

A. 讨论情况

8. 参加讨论议程项目 2 的小组成员有：民主政体共同体秘书长 Thomas E. Garrett；《存在报》主编，国际新闻学会执行理事会前副主席 Beata Balogová；人权联系会加强民主空间方案协调员 Raissa Belintani；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克莱芒·尼亚雷索西·武莱。

9. 小组讨论的重点是 COVID-19 大流行在全世界对人权、性别平等、法治和民主进程与体制的影响。与会者讨论了与疫情相关的人权挑战，特别是线上和线下的表达自由权和信息的获取，以及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与会者还审议了疫情及疫情的应急措施如何影响了妇女的人权，加剧了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包括影响了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10. Garrett 先生谈及民主腐蚀和采取一致行动加强民主复原力的问题。他强调，必须开展对话，以便更好地认识疫情对人权和民主的全面影响，并加强多边努力，在疫情后的世界中面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危机加强民主。全球卫生危机考验了全世界民主政体的能力，并在许多方面严重影响了人权和基本自由。为了应对疫情，需要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但在一些国家，这些措施被滥用于限制公民自由和选举进程。从疫情中获得的教训之一是，需要坚持民主价值观和人权，同时采取适当措施，在危机时期保持社区安全。民主治理具有开放性、透明度、问责制、包容性，并且尊重人权，使得民主政体能够克服挑战，吸取经验教训，重建得更好。确保对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保护应始终是任何危机应对措施的核心。最后他强调，需要建设具有包容性的民主，为此应确保民间社会

作为政府的重要伙伴有意义地参与应对危机，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促进青年的融入，并肯定新技术在支持有效和负责任的民主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11. Balogová 女士分享了她的观点，她谈及 COVID-19 应对措施对作为民主社会基石的自由、独立和多元化媒体的影响。她指出，记者一向在压力之下工作，但是疫情之下，由于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加剧，与卫生相关的官方信息更加难以获取，从而影响了报道质量和记者的心理健康。独立媒体在疫情期间发挥的作用是监督政府旨在降低疫情影响的措施，同时继续解释说明政府采取的措施，尽管缺少可靠信息。与此同时，批评性的报道往往被国家官员斥之为危害公众健康甚至违背国家利益。国际新闻学会记录了全世界 473 起侵犯媒体自由的事件，其形式包括逮捕或指控、限制获取信息、审查、对假新闻的过度监管以及口头或身体攻击。³

12. Belintani 女士重点介绍了疫情及其应急措施对妇女的影响，特别是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的影响。她指出了不同国家在参与性民主持续倒退的背景下加强民主空间的困难。为了说明这一点，她着重谈及疫情在巴西对弱势群体的人权和民主参与的影响，包括对贫民窟中的妇女、黑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以及土著人民和基隆布人社区的影响。这些群体所受影响最为严重，原因是获得保健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有限，暴力、排斥和社会经济脆弱性增加，缺少透明的分列数据，并且这些群体参与制定和执行影响其自身的政策的程度有限。据报告，移民妇女在获得应急福利方面面临更多障碍，并且任意驱逐和重新安置于劣质住房中的情况有所增加。她还提及一些由社区牵头采取举措减缓疫情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的正面实例，例如由妇女牵头的 *Redes da Maré* 举措，在该举措之下，不仅为巴西里约热内卢 16 个贫民窟的近 7 万人提供了最低生存条件，还在一次为处理里约热内卢贫民窟发生的执法相关死亡事件而提起的宪法诉讼中向巴西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书状。

13. 特别报告员称，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是对民主至关重要的权利，是重要的工具，可以增强人民，包括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的权能，让他们能够改变周围的世界，捍卫自身权利，塑造自己的未来。他表示关切的是，在受民主衰退和威权主义上升影响而形成的全球趋势之下，对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以及民间社会支持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的攻击加剧。他特别关切的是，危机管理总体上军事化，特别是一些措施对行使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类措施包括出台紧急状态法和以法令治理的措施，出台惩处传播“假新闻”的措施，借以压制、调查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反对派、人权维护者、活动人士和抗议者并操控舆论，以及出台赋予执法机关广泛权力，使之有权通过削弱加密或关闭互联网进行监视的法律。他强调，尊重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可以减少政府信誉的下降，减少冲突风险，增强社区应对和适应危机所致变化的权能，更好地为今后类似的紧急情况作准备。

14. 在讨论中，与会者指出，COVID-19 大流行引起了民主腐蚀和人权关切的增加，并认识到，需要加强民主以应对危机，为此需要坚持民主价值观，在各层面促进和保护人权，确保安全的民间社会空间，以社会保护为优先事项，并保护穷人和最弱势群体，从而恢复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与会者认识到，法治和尊重人权

³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Tracker on Press Freedom Violations Linked to COVID-19 Coverage。可查阅 <https://ipi.media/covid19-media-freedom-monitoring/> (2022 年 12 月 30 日访问)。

是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的基本支柱，特别是在重大危机时期；然而，一些发言者警告称，加强体制与专制倾向之间界线细微，存在越过界线的风险。与会者还一致认为，以民主和具有包容性的多边进程和机构为特点的国际团结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办法。

15. 与会者强调了疫情对意见和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的负面影响，并强调了获得可靠信息对于每个民主社会以及对于充分有效享有所有其他人权的重要性。讨论中还提及疫情及其应对措施对民主参与的总体负面影响，特别是结合选举未成或推迟，滥用卫生相关措施阻止或严重限制选举监督，在事关封锁和其他限制的决策方面缺少透明度、公开辩论和参与的背景提出了这一点。许多与会者提及，疫情对妇女的影响十分严重，特别是影响她们的工作权，因为妇女在家中的无酬护理工作不被视为经济贡献。据称，身为人权维护者、活动人士和记者的妇女和女童面临交叉形式的歧视。一些发言者提及，疫情对儿童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学校关闭对女童影响非常大，同时认识到，这样的负面影响是对民主的潜在威胁。

16. 小组成员在总结发言中重申，在危机局势中维护民主价值观至关重要，呼吁让妇女切实参与公共生活以确保民主复原力，并请各国加强民主团结和多边行动。小组成员强调了自由媒体的重要作用，并着重指出，保护记者是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不仅限于国家范围。最后，小组成员呼吁取消所有疫情期间采取的紧急措施，一些国家仍在实行这些措施并将之用于压制政治反对派。

B. 建议

17. 各国在 COVID-19 后的战略中应优先考虑可持续恢复的要素，包括保护民主价值观和人权，解决不平等问题，创建新的社会契约，承认民间社会的重要作用，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确保环境健康。

18. 各国应注重加强机构、真正的参与和自由的公民空间，以此恢复政府与政府所服务的人民之间的信任以及全社会的信任。

19. 根据国际人权法，紧急情况下政府的行动必须是必要的、相称的、临时性的和非歧视性的。COVID-19 大流行这样的危机绝不能被用作理由，借以限制民主和公民空间或削弱对法治和国际承诺的尊重。紧急措施不应用于限制民间社会组织、记者和其他媒体工作者的工作。

20. 各国应迅速重新考虑仍在实行中并继续对充分实现人权产生不利影响的紧急措施。必须确保这些限制仍然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严格界定的例外情况，接受议会审查，并受到其他民主保障的约束。

21. 各国应认识到民间社会是应对危机的关键战略伙伴，特别应认识到，民间社会在提高认识、表达关切、传播信息、制定包容性政策、向弱势社区提供支助和向政府问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恢复措施的总体效力取决于各国确保公众参与和信任的能力，只有通过民间社会行为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22. 各国应确保妇女有意义地参与公共生活和决策。性别平等应纳入所有治理和政策领域的主流。性别平等应成为一项核心政策原则，应认识到性别平等既是真正民主的基石也是其结果。

23. 各国应确保青年的融入，以此作为加强民主和防止倒退的一个关键因素。青年在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民主政府必须推动青年参与公共生活并推动他们有意义的参与。

24. 保护媒体自由和确保自由获取信息应成为危机管理和建设民主复原力的重要内容。各国应在打击虚假信息和促进媒体素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各国应加强对记者的法律保护，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记者免受威胁和攻击。支持独立新闻工作作为国家民主承诺的支柱之一，应成为国家机构战略宣传的一部分。

四. 重建的基础：建立更强大的机构，促进对政府的信任

A. 讨论情况

25. 参加议程项目 3 讨论的小组成员有：比勒陀利亚大学人权中心比较宪法教授，非洲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所长 Charles Fombad；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学教授 Chris Thornhill；律师和前法官，美利坚合众国乔治·梅森大学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腐败研究中心杰出访问教授，Be Just 组织执行主任 Claudia Escobar Mejía；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会议议员 Dyah Roro Esti Widya Putri。

26. 小组讨论的重点是着眼于加强民主体制的具体工具，特别是加强议会和司法监督，包括在多样性和代表性方面加强监督，增加诉诸司法和获得法律补救，包括在线上诉诸司法和获得法律补救的机会，承认符合法治的非正式司法机制，促进尊重权力分立原则，以及独立司法的重要性。讨论中借助从 COVID-19 大流行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如何提高公众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和信心从而增强国家决策的正当性和公众对国家决策的掌控。

27. Fombad 先生谈及他对疫情后非洲民主体制现状的看法，以及如何在强化民主体制的同时加强对政府的信任。他指出，在许多非洲国家，1990 年后的宪法改革引入了旨在约束紧急权力以防止侵犯人权的措施。然而，COVID-19 大流行体现出此类框架仍然薄弱。他表示关切的是，许多国家政府在疫情期间实施了旨在控制病毒的严格措施；专制政权借此机会获取不受制约的权力，压制批评者并破坏法治。由此严重削弱了对机构的信任。议会和法院这两个民主治理的关键机构受到封锁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二者无法行使正常的监督职能。由于封锁，非洲各国的议会要么无法开会，要么只能举行线上会议。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法院还在继续运行，并且运行程度有限，从而导致案件大量积压。在一些国家，政府以疫情为借口推迟选举。疫情时期穷人和边缘化群体最需要诉诸司法，而封锁严重影响了他们诉诸司法的机会。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数字鸿沟也严重影响了诉诸司法的机会。

28. Thornhill 先生重点谈及疫情后行政权力性质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世界各地民主政体构成的威胁。他指出，COVID-19 大流行之后，不同国家宪法制度中的行政机关获得了以高于寻常的自主性运作的权力，有时承担了通常属于立法机关的职能，或超出了国家宪法和国际法所载基本权利对其职能施加的限制。在许多国家，疫情危机被视为国家安全紧急情况，因此安全优先于人权，这几乎普遍成为了削弱程序性权利和实质性权利的理由。这种情况显而易见，在善治和负责任

地使用警察权力方面，权利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政治权利的削弱也是疫情的一个明显后果，因为政治结社、和平抗议和参与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社会权利受到的影响更为复杂，但健康权利，尤其是教育权利的下行压力是切实可见的。只有行政人员运用提升后的权力重新将自身职责与社会成员相关联，促进以基本权利作为联结政府与公民的纽带，民主才有可能重新稳定。

29. Escobar Mejía 女士结合她在危地马拉担任法官的经验，就增强法官权能和促进可靠的司法机构分享了意见。她指出，建立真正的司法独立对于年轻的民主政体和经历过武装冲突的国家而言尤其具有挑战性。为了实现社会的和平与和谐并确保最弱势群体的人权，需要优先考虑诉诸司法。国际人权规范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认，诉诸司法是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所有其他人权的促进因素。为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6，各国政府需要查明并解决司法系统之内阻碍诉诸司法的差距，例如资金制约、繁琐的官僚阻碍以及缺乏协调、独立性和廉正，这些因素都导致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猖獗，并随之导致司法机构丧失公信力。她强调了联合国为加强危地马拉司法机构而提供的技术援助所产生的正面影响。

30. Widya Putri 女士指出，当前的危机是一个好机会，可借此机会着重于制定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恢复解决方案。在这方面，她强调，需要加强议会监督，特别是在多样性和代表性方面。她认为，虽然民主不一定要要求各机构反映人口构成，但加强妇女和青年在议会中的参与对于确保决策中观点的多样性、在政策解决方案中纳入多种经验和技能以及制定代表所有公民需求的可持续政策至关重要。尽管妇女占印度尼西亚人口的近一半，青年人约占人口的 24%，但妇女和青年在印度尼西亚议会中的代表水平浮动在 20% 左右。议会中的妇女人数稳步增长，这要归功于多项立法举措，特别是要求各政党确保其成员至少 30% 是妇女，并确保每三名潜在候选人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候选人。最后她建议，除了确保均衡的代表性之外，还可以通过各国议员的集体行动加强议会的监督职能。

31. 讨论过程中，多位与会者提及，信任对于找到应对危机的集体办法至关重要，并在这方面强调，对卫生机关、科学、媒体和权力分立这一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的信任十分重要。许多发言者提及，疫情导致人民与政府之间缺乏信任，这加剧了权利被剥夺、不公正和歧视的感觉。一些发言者认为，建立在法治、保护人权和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最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和语言少数群体为本的基础之上的有效和反应灵敏的司法系统是解决信任危机的办法。一些与会者认为，只有通过建设性的科学辩论和有科学依据的政府政策，才有可能加强民主体制和提高公民对民主体制的信任。讨论期间提出的另一个解决办法是优先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帮助那些被远远落在后面的人，因为受教育程度最低和最贫穷的人对机构最不信任。

32. 与会者强调，需要打击一切形式的腐败并增加公民在公共领域的参与，特别是借助在选举背景下和参与性机制中让妇女和青年参与决策的宪法保障。一些发言者提及，利用数字平台促进公民与主责机关之间的沟通是良好的参与做法的实例。

33. 最后，小组成员强调了疫情对青年人的影响以及重新巩固社会权利制度，特别是教育权利的重要性；疫情后社会军事化的危险趋势；国际社会在提高各国打

击司法机关腐败以阻止有组织犯罪集团接管司法机构的能力方面的作用；以及民间社会在巩固国家努力以实现变革方面的作用。

B. 建议

34. 各国应出台有力的宪法和立法框架，以确保在有力监督的支持下对紧急情况作出迅速、有效和高效的反应。为此需要确保议会能够履行其监督职能，还需要坚定承诺尊重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并为法院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制定紧急措施的过程应公开透明，在此过程中应与民间社会组织充分协商。

35. 各国应利用从疫情中吸取的教训，审查并调整法院和议会等基本机构的运作程序，为今后的危机作准备。

36. 为了加强机构，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需要促进个人参与同自身生活有关的决策，促进并支持以人为本的司法，对司法服务进行投入并保护司法机制的廉正，制定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国家法律和政策并支持其执行。

37. 各国应颁布特别立法，以减轻紧急措施对最弱势群体，例如对老年人、残疾人、流离失所者、移民、寻求庇护者、性别暴力受害者和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人的影响。

38. 各国应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系统改善妇女诉诸司法的情况并增加妇女在司法机构中的代表性。

39. 当前应以法院的数字化，包括线上提交法院文件和远程审理，以及向法院提供必要设备为优先事项，以避免今后出现保护漏洞。应促进公平司法创新，包括借助电子司法工具，同时弥合数字鸿沟，以避免弱势群体的疏离。

40. 各国应确保司法职位任人唯贤，并确保司法人员的工作不受任何外部影响，从而保障司法机构的真正独立性。

41. 议会必须争取加大力度宣示和行使其监督和审查权力，以确保其他部门不滥用权力或利用危机时期破坏民主问责制、透明度、合法性和对法治的尊重。应利用议会间合作和知识转让来加强议会监督。

42. 国际社会不仅应在对安全部队进行民主监督的背景下考虑安全治理的民主做法，还应发挥安全治理减缓民主倒退的作用。

五. 同舟共济：社会凝聚力与社区主导的抵御和应对体系

A. 讨论情况

43. 参加议程项目 4 讨论的小组成员有：德国发展与可持续性研究所“转变政治秩序(失序)”系主任，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咨询委员会成员，和平与发展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Julia Leininger；克罗地亚副监察员 Tatjana Vlašić；非政府组织“青年与社会”执行主任 Charles Kajoloweka；性别平等资源中心副主任 Mohamad Mansour。

44. 小组讨论的重点是旨在加强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以便根据联合国全面应对 COVID-19 的措施，促进和平和公正的社会，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具体工具和措

施，其中包括促进社会凝聚力和投资于社区主导的恢复和应对系统并将之作为实现变革性和可持续恢复的关键步骤。⁴ 疫情扭曲了经济正义并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小组成员讨论了新的社会契约在解决疫情所致社会经济差异扩大方面的意义。

45. Leininger 女士分享了她对于以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凝聚力以及对于社会凝聚力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看法。她指出，COVID-19 大流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旨在遏制大流行的国家政策则从内部导致社会分化。各国、民间社会组织和多边组织注意到日益严重的两极对立，已将促进社会凝聚力作为优先事项。然而，由于社会凝聚力是无形的，需要更多证据来确认建立社会凝聚力的最有效工具。为了定义社会凝聚力，Leininger 女士强调了社会凝聚力的三个要素：(a) 包容性的身份或属于一个超出自己的同侪团体的更大实体的归属感；(b) 相互信任和信任国家；(c) 超越个人具体利益，合作实现共同利益。她提醒注意社会凝聚力的暗面，其内在危险是在社区内部而不是社区之间建立牢固联系，这可能导致社会分裂。极端依赖社会凝聚力的另一风险是国家不再履行其社会义务。社会凝聚力可以减轻外部冲击，但不能取代国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现有资源充分实现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的主导作用。她指出，民主机构的适当运作可创造有利于多元化的环境，是社会凝聚力的先决条件。疫情期间，在社会凝聚力较高的社会中，旨在控制病毒的措施严格程度较低，随着人们彼此以及与国家机关之间合作的改善，这些措施的解除也更快。

46. Vlašić 女士强调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作用，并指出，多元化的公民空间是建立信任、扩大未被倾听者的声音和发展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因素。她提及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其活动促进法治和民主的各种方式，包括促进和维持媒体多元化，使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能够诉诸司法和非司法机制，支持当局打击歧视、仇恨犯罪和仇恨言论，打击虚假信息和培养媒体素养，促进立法和决策以及监测立法和司法裁决的执行情况。她指出，民间社会在最近的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帮助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无家可归的人，建立基层人道主义协调单位，在克罗地亚最贫穷地区之一发生地震时提供食品和药品，以及帮助在克罗地亚寻求安全的难民。最后她强调，国家人权机构在保护、促进和支持个人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组织开展人权工作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她还回顾，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第十三次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扩大公民空间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维护者并具体注重妇女的《马拉喀什宣言》是国家人权机构与民间社会之间有效合作的工具。

47. Kajoloweka 先生着重谈及青年在打造政治问责工具方面的作用。他介绍了马拉维青年倡导的“青年宣言”模式，并强调了青年参与的最佳做法和成功实例及青年在加强民主政体方面的作用。2019 年，65 个青年非政府组织动员起来，组成了全国青年运动“青年决策运动”，以加强马拉维青年在改善政治治理和经济转型方面发挥影响的能力，并解决青年主动能力薄弱、关于青年问题的对话有限以及青年在选举周期之间影响发展政策和治理的机会有限的问题。《国家青年宣言》是经过广泛协商制定的，随后得到马拉维当选总统核可，其中阐述了影响青年的发展政策问题，以便让这些问题在 2019-2024 年选举周期中成为政治行为体的优先事项。《宣言》是一种社会契约形式和问责工具，为政府的青年政策提供

⁴ “联合国全面应对 COVID-19：拯救生命，保护社会，更好地恢复”，第三版（2021 年）。

了参考，让青年在自己的宣传工作中发出了统一的声音，并在青年和公职人员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具体而言，《宣言》在教育、卫生、青年就业和职业培训、环境和气候变化、采矿和能源、体育、文化、艺术、残疾青年、青年在政治和公民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商业创业、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基础设施发展、水和卫生以及打击腐败方面提供了政策构想。Kajoloweka 先生提及了一些青年运动取得的成就，例如成功地倡导将所有参加选举的青年候选人的提名费减少 30%，在议会中成立青年小组，以及建立全国青年委员会。

48. Mansour 先生就具有性别包容性的公民身份以及社会对话对于更好地恢复和加强应对未来冲击的复原力的重要性分享了他的看法。他着重指出，旨在控制疫情的经济和社会措施对妇女产生了严重影响，主要是因为疫情加剧了先前已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例如父权制社会、性别化的社会角色和期望、妇女主导的企业面临的资金缺口以及低利润部门妇女的比例过高。他指出，在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期间，妇女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和虐待，同时受害者也更难以诉诸司法和其他社会支助网络。他提及《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其中确认，在 2005-2015 年这十年中，妇女、儿童和弱势处境者受到灾害的严重影响，他谈及脆弱性问题和能力问题，同时谈及了政策和实践层面关于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的重要关切。他呼吁承认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在建设复原力方面的关键作用，并鼓励政治行为体优先考虑让所有利益攸关方真正参与决策进程。

49. 在随后的讨论中，与会者强调了社会凝聚力在建设健康和有复原力的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探讨了有助于加强社会的各种因素，例如在表达和结社自由得到充分实现的基础之上以透明和可信的方式运作的独立媒体；包括土著人民在内的弱势群体真正参与决策；支持少数民族语言；以有力的法律框架遏制极端主义和仇恨言论，特别是通过包容性教育、数字素养和支持校园中的社会工作者；注重社会和经济权利以及平等享有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团结。

50. 许多发言者强调了民间社会在促进社会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包括帮助社区识别和应对全球挑战，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联系，努力发挥良好的领导力，促进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确保最弱势群体，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最弱势群体的有力参与。发言者指出，健康的民间社会有助于加强法治、社会包容、经济发展和打击排斥与歧视。

51. 一些与会者重申，需要确保妇女参与决策以确保社会凝聚力，同时指出，疫情所致经济差异对妇女和女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影响，需要对这些影响进行分析，以便为今后有效的预防方法提供参考。一些与会者表示大力支持青年参与在巩固民主和促进重大政治和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

52. 小组成员在回答问题时强调，必须在潜在冲突或危机发生之前开展社会凝聚力工作。还强调了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在社会两极对立和分裂方面的作用。输出以民主和包容的方式监管线上空间的最好做法与输出技术同样重要。与会者提及，不受线上或线下骚扰、攻击或仇恨宣传影响的安全的公民空间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民主体制公信力的重要方式。

B. 建议

53. 各国应注重在潜在冲突或危机发生之前促进社会凝聚力，以此作为预防措施。社会凝聚力虽然重要，但不应被视为可以替代国家，也不应导致国家不再履行其社会义务。兼容多元化是社会凝聚力的先决条件；因此，各国应优先消除不平等，因为不平等是社会分裂和两极对立的驱动因素。

54. 各国应承认民间社会和国家人权机构是日常保障人权的重要伙伴，特别是在危机时期。为取得进展，各国应加强本国的规范框架和国家政策，以确保安全和有利的公民空间，并处理所有威胁和攻击民间社会行为体，特别是威胁和攻击在移民、环境保护、妇女权利、少数民族权利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等敏感问题领域开展工作的民间社会行为体的案件。民间社会和国家人权机构应共同努力维护人权和法治。

55. 各国应加紧努力，解决青年贫穷和经济边缘化的问题，并加强对青年组织和运动的资源和技术支助。

56. 各国应确保青年人在决策论坛中真正具有代表性。具体工具包括降低投票年龄，使有资格竞选公职的年龄与投票年龄一致，以及通过青年委员会、气候咨询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类似方式增加青年在正式治理结构中的代表性。

57. 联合国应加强与会员国的接触，以共同执行对于满足各国青年的具体需求至关重要的国家青年政策，还应借助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层面的多种参与平台，加强关于青年问题的代际对话。

58. 联合国和区域人权机制应确立侧重于青年和青年人权维护者状况和福利的监测任务，例如青年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加强国家对青年需求的回应和问责。

59. 联合国及其机构应继续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加强地方层面青年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

60. 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对于建设复原力以准备应对未来危机至关重要。为确保将性别考量纳入政策制定和恢复战略，各国应收集按生理性别和/或社会性别分列的数据，以确保快速反应措施和恢复战略都有最佳证据可用作参考。

61. 各国应确保作出紧急情况和恢复决策的机构具有性别平等专门知识，以产生更好的政策成果。关键决策、规划和执行层面充分一贯的技术和资金能力、认识和知识扶持政策以及体制机制的效力与协调，也是确保顾及性别的政策的必要措施。

六. 加强防范未来危机的措施：起激励作用的推动变革的例子

A. 讨论情况

62. 参加议程项目 5 讨论的小组成员有：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研究和倡导组织“权利、司法和社会研究中心”创始人和高级研究员，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成员，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成员 Rodrigo Uprimny；DemocracyNext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创新公民参与负责人 Claudia Chwalisz；数字权利基金会创始人，信息和民主委员会成员，Meta 监督委员会成

员 Nighat Dad；以及遏制艾滋病组织高级宣传顾问和 ACT 加速计划民间社会和社区代表平台项目管理人。

63. 小组讨论的重点是旨在加强民主保障，同时能够改善应对今后危机的准备工作的具体工具、最佳做法和新举措。与会者评估了数字转型加速给民主政体带来的益处和风险，并讨论了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最佳做法。讨论内容还涵盖了如何提升社会保障制度以加强社会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

64. Uprimny 先生分析了如何加强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护以及如何加强法治，以解决疫情导致的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和专制态度。他强调，在动荡时期和紧急情况下，人权与法治成为了核心问题，因为最弱势个人和群体的人的尊严所面临的风险最大，民主崩溃的风险也有所增加。在疫情期间认真对待人权和法治的国家在管理危机方面成果较好，并且维护、加强和深化了民主治理。当社会面临重大威胁时，使用紧急权力或许是正当的；然而，这种措施必须是暂时并且相称的，否则可能导致独裁主义的强化。在紧急情况下，还需要将透明度、自由获取信息和诉诸司法的原则作为优先事项，以便公民充分了解可能限制其人权的决定背后的理由。极端不平等与维护民主并不相容，考量所有人权时都应将各项人权作为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权利。

65. Chwalisz 女士分享了她关于创新性公民参与和新民主体制的看法。她质疑选举作为建立民主体制的唯一基础的传统作用，并指出了选举所固有的短期性和两极对立的问题。她谈及将政治和立法权力移交给普通人的做法，例如通过抽签而非选举产生议会的民主做法。⁵ 她对全世界 600 多个公民大会的实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参与、抽签产生代表和审议等民主原则并非新鲜事务，民主即商议以及民主意味着平等权利和权力的思想在土著社区和许多非西方文化中广为流传，是民主实践的核心。最近欧洲审议民主做法的实例包括法国的公民气候大会、爱尔兰的公民大会、比利时德语社区所在地东比利时的公民理事会、巴黎的公民大会和布鲁塞尔地区的公民气候大会。

66. Dad 女士讨论了数字转型加速及其给民主政体带来的益处和风险。她指出，线上空间和技术对全球连通和对话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催化作用，并有能力实现教育、团结和动员，以及扩大民主参与和对话。然而，数字转型带来的风险有：对边缘化群体的排斥、性别数字鸿沟和网上性别暴力、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武器化、仇恨言论和其他威胁民主基础的因素，包括有损表达自由的审查制度以及对记者、活动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的恐吓。数字空间监管缺乏问责制和透明度，从而将影响人权和民主参与的重要决策权留给了私营公司。作为旨在消除这种威胁的做法的实例，Dad 女士介绍了她担任 Meta 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经历。该问责机构依据国际人权框架，包括《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运作，提供独立的内容审核，就仇恨言论、欺凌和骚扰以及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用户及弱势群体等一些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断和政策建议。

67. Howe 女士重点介绍了即将出台的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关于大流行病预防和准备的国际条约中促进人权原则的情况，主要介绍了民间社会在谈判过程中的要求、期望和限制。她指出，条约草案必须能够加强和补充国际人权法中与全球卫

⁵ 见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Good practice principles for deliberative processes for public decision making”。

生有关的现有义务，特别是确保大流行病的准备和应对措施是必要且有时限的、不歧视并符合各国的国际人权法义务。条约应重申各国在健康权方面的义务，并确保及时提供所有人都能获得并负担得起的卫生产品和服务。数字技术日益成为大流行病防范的核心，因此条约应促进基于人权的方针，申明各国义务优化利益并减少诸如数据泄露、侵入性监视、偏见和歧视以及获取机会不平等等风险。她呼吁让民间社会和社区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充分和有意义地参与条约的制定和谈判，并参与设计未来的问责机制。这种参与对于确保条约符合目的、做到性别平等和立足于人权至关重要。

68. 在随后的讨论中，多位与会者表示肯定的是，国际团结与合作在防止今后发生类似规模的危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消除贫穷和失业、向弱势群体提供支助和促进这些群体参与决策方面。国际合作对于在各层面打击腐败而言也十分重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跨境危机的巨大挑战；因此，国家间合作应遵守公平和正义的主要原则。防范未来危机的保障措施不仅可以通过在国家层面加强国家机构和对政府的信任来实现，还可以借助反应更灵敏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实现。发展中国家需要国际支持与合作，以弥补本国的资源缺口。旨在加强集体复原力和就绪的多边努力，包括一项新的国际大流行病条约，需要以人权和法治为坚实基础。

69. 与会者指出，随着数字技术的融入，公共辩论中公民的参与有所增加，采用了更透明的电子服务，从而加强了民主，但也暴露了民主受到的威胁。有助于保护和促进人权和民主的新技术需要得到支持，包括弥合数字鸿沟，提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增加获得公共服务和教育的机会，协助记录侵犯和虐待行为以及支持线上人权维护者。另一方面，需要提供有效保护，防止滥用技术，例如虚假信息、仇恨言论、侵犯隐私权、网上恐吓和骚扰以及滥用监视来限制表达自由并缩小民间社会空间。一些与会者表示关切的是，在许多领域，人类的理性决策正在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取代，而算法没有受到控制。

70. 小组成员强调，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承认并应对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特别是与监控技术使用情况不透明或以处理虚假信息为借口颁布过度限制表达自由的立法有关的挑战，还需要培训解释这些法律和条例的法官、律师和执法机构。小组成员重申对当前民主危机的关切，应对当前危机需要采取创新办法，包括在选举之外建立真正的民主机构并增强其权能，以及采取彻底的措施以打破参与方面一些现有的障碍。

B. 建议

71. 各国应保障科学信息的获取；公共政策应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科学的益处，包括疫苗在内，应能够平等和不受歧视地获得。

72. 为了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解决全球民主危机，各国可以考虑采取创新的民主做法，将政治和立法权力移交给普通民众。

73. 各国应认识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加快数字化的好处和风险。各国应优先使用新技术支持旨在从疫情中恢复的有效的民主治理，并利用数字技术的巨大潜力，使政府更加透明、负责和包容。

74. 各国应依据国际人权法监管互联网，这有助于在表达自由和其他人权之间找到适当平衡，特别是在冲突和危机期间。需要特别注意社交媒体平台与执法机构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有时可能导致政府的滥用或歧视性做法加剧。这种关系需要完全透明，因为不相称或不适当的审查可能会助长发布错误信息的风气。

75. 各国在制定关于使用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民主标准时应确保对国家和私营行为体进行问责，还应考虑采取包容民间社会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方针，应增强民间社会参与这项工作的权能。

76. 国际社会应考虑通过一项关于数字权利的宣言，宣言的优先事项应为对互联网自由的承诺以及各国借助问责、透明度和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是与民间社会进行包容性协商的机制来维护互联网自由的义务。

77. 国际社会在审议大流行病防范条约草案时应确保民间社会和社区，特别是传统上代表性不足的民间社会和社区充分、平等、有意义并且有效地参与，包括实行透明和公平的认证程序，从而让民间社会和社区能够参加公开听证会，并能查阅所有与谈判进程有关的相关文件和出版物。条约草案所设想的治理结构中应纳入民间社会和社区在条约执行工作中的充分参与。条约草案应遵循基于人权的方针，包括承认公平是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病的核心原则、指标和成果。

七. 重点讨论

78. 2022年11月24日，在论坛第二次会议期间进行了第一次重点讨论，主题是疫情后背景下全球民主的状况。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民主多样性(V-Dem)研究所创始所长，V-Dem项目首席研究员 Staffan Ingemar Lindberg 作了主旨发言。

79. Lindberg 先生在发言中介绍了他对于独裁形式的民主腐蚀的看法，独裁形式的民主腐蚀是与民主化相反的过程，Lindberg 先生的观点依据的是 V-Dem 研究所收集的证据，包括 500 项民主指标，这些指标在世界各国测量，涵盖时间自 1900 年至今，由来自 180 多个国家的 3,700 名专家收集。⁶ 研究所开发的数据集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制度：(a) 自由民主；(b) 选举民主；(c) 选举专制；(d) 独裁。根据数据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2021 年全球普通公民享有的民主程度降至 1989 年的水平，在过去 10 至 15 年间出现了衰退，而独裁制度却在上升：世界 70% 的人口(54 亿人)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从数据集中还可以看到，独裁的性质不断变化，其特点是有害的两极对立，这一术语可用于描述将政治反对派归类为国家敌人从而将限制反对派的权利和自由合理化的国家言论。通常与两极对立加剧相应存在的是国家内部及外部对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的使用均有增加。Lindberg 先生强调了抵制独裁进程的重要性，还根据 V-Dem 数据集并结合其他实证证据强调了民主的促进作用。例如，被归类为民主政体的国家往往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并避免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在惠及穷人和边缘化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的投入也大得多。民主政体往往将更多资金用于健康保护和卫生系统，这种方式提高了预期寿命并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最后，民主政体对制定和实施缓解气候变化战略的承诺更为有力。

⁶ 见 <https://www.v-dem.net/data/the-v-dem-dataset/>。

80. 在随后的讨论中，与会者重申促进正义、发展、自由、民主和尊重多样的全球文明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探讨了民主化与军事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审议了自由民主政体如何能够防止国家向国外传播虚假信息。

81. 第二次重点讨论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在论坛第三次会议期间举行，主题是论坛往届会议建议的执行情况。作主旨发言的有：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贾亚特玛·维克勒马纳亚克；各国议会联盟人权方案管理人 Rogier Huizenga；国际发展法组织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观察员 Mark Cassayre。

82. 维克勒马纳亚克女士向与会者介绍了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在落实论坛第一届会议各项建议方面的工作，第一届会议于 2016 年举行，会议重点是青年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⁷ 她指出，相比于 2016 年，青年的参与已不容置疑：在通过法律、谈判预算和向政府问责方面，青年人得到代表的权利不可剥夺。将青年排除在这些进程之外侵犯了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削弱了他们对当今所有人的利益和后代利益的宝贵贡献。自论坛第一届会议以来，在政治上承认青年参与并为增加青年有意义的参与进行投入的情况变化显著。她强调，尽管采取了积极举措并取得了进展，但青年人仍然面临多重和多方面的挑战，COVID-19 大流行加剧了许多现有的人权不安全因素。具体而言，青年人在议会中代表不足，导致他们对政治失望，对正规机构和政治制度感到不信任。她介绍了最近采取的一些举措，这些举措旨在加强青年在联合国机制中的参与，⁸ 确保青年总体，⁹ 特别是人权活动人士¹⁰ 享有安全的数字空间，谴责任意拘留、不公正审判、警察暴力和骚扰参加和平抗议的青年的行为，¹¹ 促进青年参与和平进程，¹² 转变教育¹³ 和倡导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¹⁴

83. Huizenga 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自论坛第二届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第二届会议于 2018 年举行，会议的重点是议会在促进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的作用。¹⁵ 他在提及《2022 年全球议会报告》¹⁶ 时指出，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推动了变革：接受调查的议会中有 87% 报告称，本议会的复原力有所提高，并且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有所增加，已被视为对议会未来工作具有战略意义的因素。关于议会与

⁷ 见 A/HRC/34/46。

⁸ 联合国青年战略。

⁹ 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如果我消失：在公民空间中保护青年全球报告》(2021 年)。

¹⁰ 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安全使用推特：青年活动人士对照清单——关于数字安全和线上保护青年人的指南”(2022 年 7 月)。

¹¹ 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及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世界各地青年领导的抗议活动期间暴力升级的联合声明(2020 年 10 月 30 日)。

¹² 青年、和平与安全全球联盟，《在国家一级执行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公职人员指南》(纽约，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2022 年)；青年、和平与安全全球联盟，“我们同舟共济：实施包容青年的和平进程五年战略行动计划”(2022 年)。

¹³ 《关于转变教育的青年宣言》。

¹⁴ 见 <https://www.un.org/youthenvoy/about-the-young-leaders-for-the-sdgs/>。

¹⁵ 见 A/HRC/40/65。

¹⁶ 各国议会联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2 年全球议会报告：公众在议会工作中的参与》(各国议会联盟，日内瓦，2022 年)。

公众接触的问题，他指出，委员会的听证会，包括在地方社区举行的听证会，是与公众协商以获得证据从而支持议会工作和立法的最广泛和最成熟的形式。专门设立的议会人权委员会仍然是通过议会进程将人权纳入主流的重要工具。自 2019 年以来，全球议会中此类委员会的数量增至原来的两倍。他报告说，在确保妇女在议会中的代表方面取得了缓慢但稳步的进展：妇女在议会中的代表已增至 26.4%。这一进展主要是由于实行了员额制；然而，这种员额制必须明晰、起草得当、由执行机制支持并被视为妇女参与的最低要求而非上限，才能行之有效。保护女性议员免遭报复和恐吓对于真正的性别平等至关重要。他强调，议会在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特别是参与普遍定期审议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关于编写国家报告的指南现已纳入一项具体要求，请各国列入议会参与编写报告和参与执行以往建议的详细情况。一些条约机构还肯定了让议会参与本机构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其结论性意见中列入了请议会参与的具体要求。¹⁷

84. Cassayre 先生概述了为落实论坛第三届会议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第三届会议于 2021 年举行，会议重点是所有人都能平等诉诸司法是民主、法治和人权保护的必要要素。¹⁸ 他强调，迫切需要将法治和诉诸司法作为优先事项，首先是国家应提供充足资金，他呼吁各国让此事项在尽可能多的国际文书中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力的法治机制，包括诉诸司法，是预防冲突、侵犯人权和流离失所的关键工具。他列举了最近的一些举措，这些举措着眼于在国际论坛提升对法治和法律专业的关注度，例如人权理事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第 50/5 号决议，以及国际发展法组织与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为支持加强司法机构(包括通过开展反腐败努力)而建立的伙伴关系。他着重介绍了最近的一些旨在解决诉诸司法方面的不平等、歧视和边缘化问题的举措，这些举措尤其有助于以人为本的司法¹⁹ 和气候公正，²⁰ 并侧重于诉诸司法的性别方面。²¹ 他建议成员国促进就论坛第三届会议的具体结论采取行动，在人权理事会决议中纳入支持诉诸司法、法治和保护律师与法律专业人员的措辞，促进反腐败举措，让弱势群体更多地参与关于法治和诉诸司法的讨论，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的关注度，促进正规司法机制与习惯司法和非正规司法系统之间的联系，继续努力找到弥合数字鸿沟的途径，并确保新技术能够改善诉诸司法的机会而不损害人民的权利。

八. 结论

85. 第四届会议主席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了讨论中提出的要点，这些要点可推动进一步的行动。她指出，目前不是限制民主的时候，这是一项关键结论。反之，加强民主是危机后可持续地恢复和提高复原力以面对 COVID-19 大流行与气候变化

¹⁷ 例如，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和各国议会联盟关于议会在执行《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方面的作用的联合声明(2022 年)。

¹⁸ 见 [A/HRC/49/80](#)。

¹⁹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Framework and Good Practice Principles for People-Centred Justice (Paris, 2021);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aw Organization, “Strategic plan 2021–2024” (Rome, 2020)。另见 [A/77/162](#)。

²⁰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aw Organization, “Climate justice for women and girls: a rule of law approach to feminist climate action” (Rome, 2022)。另见 [A/HRC/50/57](#)。

²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性别公正平台。

等当前和未来的紧急情况的关键。可持续地恢复意味着首先帮助最边缘化的人。为了确保这一点，需要将边缘化和最弱势群体纳入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所有阶段。

86. 主席强调，多边主义仍然是从全球危机中可持续地恢复的重要方法。论坛和其他联合国论坛为通过多边行动加强民主团结提供了重要空间。

87. 主席强调，数字化的日益发展既有益处也有风险。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数字化都需要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还需要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新技术能够提升而非限制人们的权利。

88. 主席总结了多位发言者在论坛期间发表的意见，同时强调，迫切需要让青年人从民主对话的边缘走向中心。青年在政治中缺少代表性造成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而此时最为需要对政府的信任。世界各地的实例表明，青年并非不关心政治。青年实际上发挥了带头作用，他们十分希望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并让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青年的参与必须制度化、得到协助并得以持续。她指出，论坛期间提出的主要的贯穿各领域的问题之一是妇女和公民空间在可持续恢复中的核心作用，她回顾，为妇女和民间社会行为体创造包容、安全和有利的环境是行使公共自由的关键。

89. 最后，主席表示，需要在危机之外关注社会凝聚力，这似乎是为未来的紧急情况作准备和减少独裁主义出现或加强的可能性的最佳途径。社会凝聚力的一部分是在消除不平等的基础上重新订立的社会契约。有力的社会政策与更强大的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民主如果无法实现经济转变则会成为对民主本身的威胁。为了保护民主，法治和诉诸司法应当成为优先事项并需要得到支持，包括通过国家供资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获得支持。